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華中學術

Central China Humanities

第14輯

主編 戴建業

2016 / 2
VOL.8 NO.2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華中學術

Central China Humanities

第14辑

主编 戴建业

2016 / 2
VOL.8 NO.2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学术(第 14 辑)/戴建业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622-7405-6

I. ①华… II. ①戴…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8893 号

华中学术(第 14 辑)

©戴建业 主编

责任编辑:王中宝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7792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371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5

版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3.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华中学术》(第14辑)编委会

顾 问：邢福义 王先霈 刘守华 王庆生
王忠祥 张三夕 孙文宪

编委会主任委员：胡亚敏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王 炜 王齐洲 王泽龙 刘 云
汤江浩 许祖华 苏 晖 陈建宪
汪国胜 张岩泉 周晓明 高华平
聂珍钊 储泽祥

主 编：戴建业

副主编：邹建军 魏天无

本期执行编辑：王洪涌

封面题签：余斯大

目 录

【学缘漫忆】(主持人:张三夕)

老黑尚欲身当道,乳虎何疑气食牛

——施议对的学术渊源 崔海正 1

师门散忆 成松柳 1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专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持人:胡亚敏)

马克思文学批评话语的读解方式 孙文宪 21

历史视域中的现代文学

——管窥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意识 刘 欣 36

【国学研究】(主持人:王齐洲)

论商代的社祭 赵 林 45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关于《老子》条目下之讹文误释指瑕 陈锡勇 72

【古代文学研究】(主持人:汤江浩)

试析西汉学坛今文《春秋》内部公羊、谷梁两派势力的消长 韩维志 李华雍 83

《楞严经》“七处征心、八辩还见”的现象学意义 桑大鹏 曾广丽 91

杜育《舜赋》文体今属辨 柯昌文 99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人:许祖华)

“人的文学”理论基点与民国文论体系构架 黄 健 107

丁玲小说的身份意识与生命意识 阎浩岗 116

论新感觉派的暴力叙事与暴力审美 杨 程 126

华中学术(第 14 辑)

【民间文学研究】(主持人:陈建宪)

清江流域土家族谭姓始祖记忆研究	林继富 133
鹊桥缘起考论	徐明英 144
东岳神祇:帝王与庶民的信仰	张 丽 151

【汉语方言研究】(主持人:汪国胜)

广水话的处置句	张艳玲 159
汉语方言否定形式的多义性与多样性	陈 芙 166
情感助词及其语法化路径 ——以甘肃宁县方言情感助词“屌”为个案	罗 堃 172

【古代汉语研究】(主持人:曹海东)

禅家会话过程中转移话题的艺术	卢烈红 182
汉语起源感叹说的历层证明	夏凤梅 郭 攀 190
《史记》、《汉书》中的商业管理类词汇	王洪涌 197
近 30 年黄侃及其学术研究	张鹏飞 207

【博士生论坛】(主持人:魏天无)

新 HSK 四级考察语言点分析	韦 钰 214
话语标记“你看”及其演变过程之辩	周振峰 228
本科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的相关性研究	王斯璐 237
诗歌、艺术与真理——论巴迪欧诗学思想的逻辑展开	张 璐 246

《华中学术》来稿注意事项	254
--------------------	-----

老黑尚欲身当道，乳虎何疑气食牛

——施议对的学术渊源

崔海正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01）

一、学词与词学，得而兼之

施议对字能迟，号钱江词客，又号濠上词隐，台湾彰化人，出生于闽之泉州。自幼家境贫寒，祖上亦无读书之人，中小学阶段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考取研究生，然遭逢“文革”，未及毕业便被迫迈向社会，在解放军农场、钢铁厂接受再教育。虽说那个年代正邪不分、忠佞难辨，但他凭借家庭出身的先天优势，毕竟被当作“自己人”看待。不过，他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对仕途亦无奢望。他看重的是学问，仰望着的是词学的星空。他要一辈子为词学而拼杀、奋斗，过往的生活只算是一段人生的历练。所以，后来能“蟾宫折桂”，再次攻读硕、博士学位，又南迁港、澳，驰骋于诗坛、词坛，成为著名学者。这一过程当中，自然由于时世的变迁所促成，实在也是一种必然的“运气”。

施议对的某种“幸运”，跟他的性格关系极大。大致说来，福建人爱闯荡，不尚空谈，不爱锋芒毕露，但内心强毅，颇具韧性，读书向学皆刻苦用功。而地处闽南沿海的泉州，正如有人所说，其祖先多为中原移民，虽沧海桑田、时光推移，却仍旧隐含着所谓燕赵慷慨、爽直之风，此又与江南的机灵智敏得到了奇妙的化合，加之近世以来这一名扬四海的侨乡之开放与包容，使中外文化与古今文化于此得以会聚，生于斯、长于斯的施氏不能不受到潜移默化之影响。当然，作为文人，除知书达理外，他还特具泉州人那种不讲客气、少说多做、敢拼敢赢的脾性，学术上奋取求进，视域开阔。2015年秋末，我邀其出席在济南召开的“李清照辛弃疾暨刘乃昌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并在济南大学文学院进行学术讲演，他不仅慨然应允，而且认为举办会议之不易，便断然谢绝了大会对他的某些优惠；同时，尽管南方地域口音多少抑制了他的普通话表达，但其高水平又有针对性的演讲却博得了济大师生的热烈欢迎。施先生是年届七十五的老学者，对他泉城之行，我总觉照顾有欠周到，而他却说考虑细致，安排得当，体现其对后辈的宽厚。他对一切好像都显得心中有数，不慌不忙，落落大方。又因其与恩师刘乃昌先生先后同出夏承焘先生之门，故多次嘱我访查夏门弟子及再传才俊，以便今后建构词学传授统系。由此，我对他的为人、为学似又多了一

层了解与亲近感。

俗话说,耕耘必有收获。不计“文革”十年荒废,到2015年底,三十余年的勤奋与务实探求,换来了令人惊讶的硕果。这期间,施议对已出版专著三十余种,在各种重要报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另有不少邀请讲席及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宣读论文,还创作了数百篇旧体诗词。其骄人的高产数字,足令同行中勇者艳羨、惰者汗颜。专著中,《词与音乐关系研究》颇负盛名,国内外学者一片赞誉之声。另有《人间词话译注》《胡适词点评》《宋词正体》《今词达变》《词法解赏》《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以及《当代词综》等等。论文如《建国以来词学研究述评》《百年词通论》《百年词学通论》《词体结构论简说》《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演讲》《二十世纪词学传人》《倚声与倚声之学——关于文体因革以及科目创置问题》《声成文,谓之音——倚声填词中的音律与声律问题》《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关于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中国词学史上三座里程碑的理论说明——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的建造问题》以及《新声与绝响——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及前景》等等。这些论文从所发报刊的档次,或者自身水平及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不引起词学界的关注。比如,《建国以来词学研究述评》发表后,1984年4月16日上海《文汇报》署名刊出讯息:唐圭璋先生谓其“自抒己见,颇有特识”;万云骏、陈邦炎、缪钺、吴调公、霍松林等十几位名家对其不蹈流俗之言论也给予极高评价。又如《声成文,谓之音——倚声填词中的音律与声律问题》一文在《词学》刊发时,该刊《编辑后记》特言:“词与乐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由于词乐的失传,这种研究有一定困难,近年成果也并非很多。施议对先生是此方面的专家,本辑发表他《声成文,谓之音(副题略)》一文,希望引起读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亦可见其权威性影响力。

二、师道、父道与词学之道

施议对说,他出身贫寒,无有家学渊源,但师生情缘不浅,从小学开始,就一直遇到好老师。在多位老师当中,霞浦黄之六(寿祺)、永嘉夏瞿禅(承焘)以及海宁吴子臧(世昌)是他终生最为难忘的。他说:“他们把我当作亲生儿女看待,我把他们当作父亲一样敬重。”^[1]生当忧患,成于艰难。施议对在求学与治学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每一成绩的取得,既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也与导师的教督密切相关。

(一) 三度蟾宫折桂: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毕业

1960年8月,施议对考入福建师范学院(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勤苦向学,成绩优异。到大三年级,他打量着自己,据平日兴趣,索性专攻宋词,梦想以后当该方向的研究生,并为此悄悄准备。然则因根基太浅,不免常有困惑。于是,他找一位霞浦同学相陪,大着胆子去拜访中文系主任黄寿祺先生。黄先生热情地给他讲解关于词的各种知识,回答他的疑问。他说:“这是我从事词学专门研究的第一课。”此后,他便不断登门讨教。1964年春,报考杭州大学夏承焘先生研究生,被初步录取,黄先生亲自指导并诚请全系古代文学老师帮他修订复试论文《龙川词研究》。施议对说:“这也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因此学会了怎样独立进行学术研究。”^[2]施议对

说，在黄寿祺先生门下，除了专业知识和专业科研训练，最大的收获是懂得将师道当父道看待。

到杭州大学，跟随夏承焘先生攻读宋词，夏先生很器重他，给他讲词、唱词，讨论有关问题；师徒情深，他曾和夏先生的大弟子任心叔一起在先生家中过年。夏先生做学问讲究一个“笨”字，谓笨从本，这是为学的根本。施议对也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所谓“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朱熹：《朱子语类》卷八），沉浸在良师与志趣相包围的气氛中，发奋向学，并抓住每一次与先生接触的机会，思之自得。或偶有懈怠，先生写赠“老黑尚欲身当道，乳虎何疑气食牛”之条幅，以壮其志气。然“文革”中夏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游街、批斗，后下放到农村劳动；而施议对则经由红卫兵、军垦战士，于1970年到三明钢铁厂当一名清渣工人。不过，无论怎么折腾，他都始终记挂着自己的诗书事业，不相信“读书无用论”，希望有一天能够“归队”，再到老师门下聆听唐宋词；对所谓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旧文化”等等，他也自隐情愫，保留着自己的看法。那段时间，施氏曾赋小诗一首，记录当时的心境。诗云：

却向疏篱觅小诗，想看冷眼且随伊。今生落拓我能信，直挂云帆会有时。

赋得这首小诗，正在炼钢炉底清渣。但他不相信，永世不得翻身。这诗说心境，另有一诗说心愿。诗云：

最喜先生写竹枝，盎然情趣我能知。何当遂我归来愿，籍易更听唐宋词。

这首小诗，寄呈黄寿祺先生。黄先生当时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随即赐和一诗。云：

喜尔生花笔一枝，能谙古典写新知。老夫耕罢饶诗兴，日盼飞鸿寄伟词。

1974年9月，施议对被调往省里注释法家著作，那就是福建省李贽著作注释组。评法批儒，大势所趋。所幸的是，当时黄寿祺先生已先到这个组。又有机会与先生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年。因此，虽则受到那个时代极“左”的传染，但这种注释工作却时刻提醒着他“不忘古典”，回梦宋代；磨砺着他重依据、查材料的耐心，以及黄先生所常告诫的趁年富力强、应抓紧读书打好基础、先经史而后子集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等等，在曲折的学问征途上，并未完全迷失前行的航标，也学到了以往书本上学不到的，比如逆境中如何做人等等，对人生有重要意义的许多东西。

1978年，社稷重整，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教育亦不例外。施议对及时地抓住这难遇的良机，决定重新报考研究生。果然，榜上有名，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导师为世昌先生，实现了长久以来日思夜想的“归队”夙愿。其时，吴世昌先生门下弟子五人。施氏得吴先生亲自指导，主攻宋词。吴先生海外（旅英）归来，见多

识广,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学问了得;而其耿率之真性情,疾恶如仇之品格,诙谐辛辣之语言,尤其既痴且狂之个性甚至文风,都使施氏深受感染。京师三年,在吴先生的严格教督下,他不仅进一步洗刷了某些“心野”浮躁等不良习气,摆正学问正途,也更加培养起独立研究的精神和勇克难题的能力。而在这一时段,夏承焘先生也居住北京,施氏亦多所请益。1981年夏,施氏以《词与音乐之关系》一文,六万余言,获取文学硕士学位。

从大学本科,受业于黄寿祺先生门下起,直到研究生毕业,这大约二十年的风雨、学问之途,想来令人感慨。不过,施议对也有少数科研成果问世。除硕士论文外,1974年和1975年,他以戎为今的笔名分别发表《略论陈亮与朱熹》、《论李贽的文艺观》两篇文章^[3]。自然,文中带有较深的儒法斗争的时局烙印,此不多述。而第一次报考研究生时所准备的关于陈亮词的文章,到京后略加整理,改题为《论陈亮及其〈龙川词〉》,稍后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4]。现在看来,文中某些表述如“陈亮不可能突破自己的阶级局限去为中国人民苦难呼号,因而词作中也就不可能真正反映广大人民受掠夺、受奴役的痛苦,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情况”,“他的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情趣、思想感情、美学兴趣,也难免在词中流露出来”等,显然折射出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但文章能对陈亮其人及其词作(尤其是所谓“爱国词”)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并指出其艺术上的成就(如风格多样、以论为词、语言运用等)与几点缺陷,已经颇为难得,况且又是初出茅庐之作。而发表于1980年的《李清照〈词论〉研究》就显得更加成熟。该文主要针对建国以来关于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命题的歧见进行论析,题目由吴世昌先生所确定。文章指出,不少论者认为李清照的观点“落后保守”、阻碍词之发展的“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文中先是“釜底抽薪”,给苏轼所谓“以诗为词”等概念内涵予以正确理解,否定了质疑“别是一家”论的主要依据;接着正面阐述李清照《词论》的有关主张,缕述宋词发展的历史趋势,说明应以科学态度充分认识词有别于诗的重要意义。要知道,那是在浩劫甫过、学苑春讯始动的背景之下,一个研究生在回答一桩词学公案时所显现出的学术棱角,不能不让人另眼相看。同时,施议对还能关注到域外词学,撰写了《东瀛词坛传佳话——中国填词对日本填词的影响》一文,可见其学术视野已不限于中华本土。

1983年,施议对在《文学评论》做了两年的编辑工作后,再次以在职身份报考吴世昌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课程。这时,他已过不惑之年。然学无早晚,岂可一日而息。经过三年拼搏,终于金榜题名。198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成以钟敬文任主席,万云骏、启功、陈贻焮、李纯一、缪钺及吴世昌诸先生为委员之豪华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了他以《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到此时为止,施议对已先后三次当上研究生,三度蟾宫折桂。如从小学算起,到此时,施氏已读了二十六年书,有人说这可能创造了中国最高学龄纪录。

施议对的博士学位论文《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被学界誉为近百年来词学研究集成之作。这部著作,实际上在论文答辩之前的1985年7月,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因入选博士论文文库予以再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唐宋合乐歌

词概论，主要描述合乐歌词的演化轨迹，论证词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离不开音乐的制约；中卷词与乐的关系，着重阐明词受制于乐具体状况及词乐关系对于词之影响，寻绎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下卷重在总结唐宋词合乐的历史经验，分析词与乐之同异及二者合与分之利弊，试图为中国诗词的创作提供借鉴。此著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容量大致为三十万字，它从若干方面探究了词的特性及自身发展，论述了词与乐之间制约及反制约关系，回答了词史上一些复杂现象和研究工作中众说纷纭的不少论题，充分肯定了宋词的社会与艺术价值，不仅获得答辩委员会诸老的高度评价，也迅速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此著使施氏名声大噪，奠定了他词学观念的深厚基石，大为提升其回应某些争论议题的学术能力，此后他的不少词学观点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线索或答案。

自重新报考研究生课程，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到在职攻读博士课程，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这一时间段，除了对词史及某些专门问题的探索，施议对还把很大精力投放于《当代词综》（六卷四册）的编纂上。该书前言题称《百年词通论》，对近百年来词之嬗替、如何评价、词业现状及其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此外，他还撰著《建国以来词学研究述评》一文，对建国后至1982年间的词学研究状况加以认真观照与审视，就词之发展史及历史地位、作家作品论、词学理论研究、词学有关著作等撰为综述并就其中有探讨价值的问题发表己见。

（二）师道与父道：照着讲与接着讲

人生有许多导师，笼统地讲，比如说生活是导师，社会是导师等等；若从知识和风习传授的角度，比如说书本是导师，父母是导师等等；若从治学的角度，则应把帮助自己提高专业水平的人都称作导师。这里面大约有间接的与直接的两类，其间情况又有不同。就施议对而言，远些的如李清照以至王国维、胡适等，近些的或有的当时尚健在的如徐行恭、沈轶刘、陈兼与、唐圭璋、缪钺、施蛰存等，皆为导师，甚至到港、澳后，给予他不少指点的梁披云、饶宗颐亦可入列。但直接授业且对其影响最大者，是黄寿祺（之六）、夏承焘（瞿禅）、吴世昌（子臧）三位先生，而且都与词道紧紧联系在一起。

施议对把师道视同父道，践行古训，说做合一。如黎枫的一篇采访文章即谓其“自幼拜师，极重师道”^[5]；他自己也一再提到亲如父子的师生情谊。他对于恩师黄寿祺、夏承焘、吴世昌先生及其学术备极推崇。他虔心向学，感念恩师的栽培，并撰著为文，在恩师生前及身后相继发表，表达其内心感受。在《师道与父道——怀念我的老师黄之六先生》、《说我的师生情缘》以及《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逝世十周年祭》、《一代学人吴世昌教授逝世十周年祭》等文章中，除了就大节出处，记录恩师业绩外，还记录了他在求学期间与三位先生交往的许多细节。如夏先生仿如坡仙再世，旷达通天；吴先生钟情稼轩，善恶自明等等。特别是夏、吴二位导师病重期间，他随侍左右，守候病榻，又为其送终，至为感人。他和导师真心实意以待，导师做人、处事的真性情，处世、为学的思路与门径，他能亲历亲见，这许多是于文字之外求得的无形之宝，可终生受用。所以，在几位先生去世之后，也激励着他谨记教诲，自强不息。

当然，此处注意的还是与词道的关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便不断在有关

论说中阐述导师治词的成就与自己的悟解,仅专门性文章即有二十余篇。如《瞿髯翁治词生涯侧记》、《一代词宗夏承焘》、《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吴世昌论词学研究》、《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易学与词学——排列组合与数位解码》等等。

以下说说三位导师的治词之道及其对于施议对的影响。

黄寿祺先生,施议对大学本科时的授业导师。精研易学,被誉为宗师,一般人可能不大容易想到易学和词学有什么瓜葛,但施氏却以黄先生演绎的经验研治词学,撰上述词学与易学关系之文,希望为21世纪词学提供参照。因为在他看来,“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原始符号的张舍布列,喻示天地间之道和理,词体之排列组合,同样表示一种道和理(声和情)。词之道和理与易之道和理,相通相合处集中体现在张舍布列及排列组合的对立、对等关系和共同规矩准则上。其无常而有常,两个互相对立的单元,加上中介物,组成一个矛盾而又互相依赖的统一体。易如此,词亦然,这是易学与词学的一种内在联系。当然,二者有相合处,亦有不相合处,但总存在着可比性。因此,由易学而词学,进行比较研究,自信定有收获。文中并举若干实例,如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苏轼《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辛弃疾《菩萨蛮》(青山欲共高人语)、《贺新郎》(绿树听鹈鴂)等,分析、说明词和易之道与理、规矩准则、无常变化、二元对立等方面的共通性。谓当今世界,以数码对话、接轨,一切都在其排列组合中,词学与易学所具普世意义与价值,必将为各种创造提供宝贵资源。这一论述真是别开洞天,启人遐想;立论于天地人之间的大千世界,也把词学的建构提升到哲理层次。

夏承焘先生,一代词宗。词学成就卓著,人们熟知。施氏亦多方论列,其《寿星明》词赞为“驰骋骚坛,声学宗师,今代坡公”,谓其拿手好戏在于声学。此仅举一例。夏先生《唐宋词字声之演变》有云:

词之初起,若刘、白之竹枝、望江南,王建之三台、调笑,本蜕自唐绝,与诗同科。至飞卿以侧艳之体,逐弦吹之音,始多为拗句,严于依声。往往有同调数首,字字从同;凡在诗句中可不拘平仄者,温词皆一律谨守不渝。

施氏对之详细分析,说这段话不仅说字声,而且说句式,直接切入歌词体制之建造。因为论句式,谓何处为拗为顺,并且“词皆一律谨守不渝”,则为歌词独有,亦歌词与歌诗分科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段话表示乐歌形式推移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三件事,即从音律到声律,由不定声到定声;从律式句到非律式句,由一般到个别;从无邪到邪(侧艳),由同科到不同科。此可称为夏论三段,它精确地展现了倚声填词自身在型格上推移之过程,又明白揭示科目创置之事实,颇具划时代意义,其论断也必将成为文学史的定论。你看,发明师说何其精彩。

至于吴世昌先生,虽不专研词学,但善于独立思考,常有“翻案”事证。八年相处,因其于麾下获二学位,似体察尤深。施议对不仅乐于接受先生严厉的挑剔和不留情面的批评,涤除不良习气与文风,畅游学术,发明亦多。比如追随吴先生极力反对豪放、婉约二分法,所教的学生如持此类观点甚至不给分数,又追其源流,明其误

害。吴先生的结构分析法，他更上升为理论，使新变词体结构论成为词学史上三大里程碑之中的最后一碑，其意义十分重大。但他也不完全是对导师的观点被动接受，亦步亦趋，他有自己的考量，或在其所提线索上另行开辟。如吴先生不太喜欢王国维和胡适，但他在阅读过程中，感悟到二人都懂得分期、分类，对中华词学立下的功劳实在了不起，并大大影响了自己词学观念的建立，于是才有了一系列相关论述。吴先生不相信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所谓“问途碧山”那一套，不从王沂孙而偏从晏几道开始，因对小山的痴情尤有会心。他由此受到启发，悉心探索，另出机杼，提出柳、李、苏、辛四家，以达“词之似词”的境界。旧四家所示，难以落到实处，亦难言传；新四家说，每一步骤都有一定的规划和实现标准。研究新四家其实涉及入门之途径问题。因为贯穿起来，进行终极目标和达至目标的方法与途径的归纳、描绘，也就方便探测宋词的基本结构模式，进而探讨词之似词的最佳状态^[6]。这也是另一层次的发明师说。同时，吴世昌先生耳提面命，嘱其读书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更使他终生不忘“读原料书，直接与作者交涉”，重视自己的第一手感觉，这是最真的感受，也是防止上当受骗的一个办法。“在方法中，尤其是对于词，最初、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读法”，具体步骤为“了解、想象、欣赏与批评、拟作与创造”，词学研究，必须打好这基本功。“你所写的论文，如果是在现有的一百篇当中，再加上你一篇，成为一百〇一篇，那就没多大意思；你所写的论文，应当是某一方面的第一篇，而且，以后人家搞文学史，一接触到你所论述的问题，就想起施议对曾经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非找来参考不可，这样的论文，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要用死功夫，自己去摸索，最后自能登堂入室。”^[7]鼓励他言前人之所未曾言，发他人之所未敢发，勇闯新路，为学术大厦增添瓦椽。他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是这样写出来的，其他一系列的论说也是这样讲出来、写出来的。

当然，发明师说须师有可发明者，他很幸运，几位导师皆不凡之士，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可为大众之师；而施氏能作发明，重要者首在贵其师，又爱其资，并努力悟解。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亦涉文化传承问题。至于从导师那里接受多少，自己发扬多少，给下一棒传递多少，在这根链条上的分量和作用如何，则情况不一。盼其能作为精神偶像，弟子敬学，光大词道。

施议对的三位导师，黄寿祺、夏承焘、吴世昌先生，凭藉自己的学识与阅历，在各个不同领域和学科给予他教示，施议对于各个方面亦多所发明并有一定的建树。

1989年春、夏之交，施议对撰著《词体结构论简说》一文，首先依据吴世昌先生的结构分析法，尝试构建词体结构论。文中指出：从王国维的境界说，再到胡适、胡云翼的风格论，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对词体发展有所助益，但并非词之本体理论；所谓宏观研究及系统论方法，亦未能开辟新境。而所谓结构论，即对词体结构方法的研究，也就是对词之外形式与内形式进行结构分析，以探其构造法及词人的审美意识与思维模式，乃是建立词之本体理论的基础。其中，词谱模式、分片方法、词调关键部位作法等属于外形式，即一般结构方法，多属常识；特殊结构方法偏重于内形式，体现个性独创。如屯田体的时空变换、“从现在设想将来谈到现在”^[8]，清真体的故事勾勒以及稼轩体等，方可作为填词、论词者提供切实门径。1990年6月，施议对携《词

体结构论简说》参加在美国缅因举行的词学讨论会,颇为北美学者所赞赏。

同是在赴美的这一年,施议对另一部著作《人间词话译注》出版。这是夏承焘先生生前所托付的一部专门著作。1983年春,夏先生受命合作译注《人间词话》。当时,写成若干则,并呈审阅。但此事搁置多年,直至夏先生去世之后,方才由施氏独力完成。此书以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为底本,参校他本,于本编、删稿、附录、补录共得一五六则,又辑校词话选二十三则。不仅是辑录词话最多的一种本子,其注、译也显示出深厚的功底与文字表达能力,可读性亦强。鉴于这类文体不便引述原文,此仅举“境界”之附注大略如下:先释其本义,指一定疆土范围;再说经佛家借用,表明参悟深度,引《无量寿经》说;又说诗家之境界包括三境(物、情、意),王氏所说境界亦在此中;但其所说乃由《诗经》中拈出(《鲁颂·駉》之“思无疆”等),并认为真正道及诗歌之本源。其释义深刻而释文简括易懂,窥一斑可略知大概矣。

也许令人更感兴趣的是施议对由此对王国维及《人间词话》的认知与生发。在《人间词话译注》初版之前,他以《王国维治词业绩平议》发表该著“前言”^[9],认为境界说是其理论核心,可帮助人们摆脱传统诗教(比兴、寄托说等)及批评标准、方法之束缚,但也往往将思路引向词之外部,以至牵强附会。因此它仅是一般艺术批评标准,并非词本身之理论;王氏论词重北(宋)轻南(宋),亦为后来豪放、婉约二分法论词开启先例,有误人误世之嫌;而其写词步五代、北宋之径,又重在意,倒独擅胜场。1993年,他为拟出《人间词话译注》撰写《导读》,次年又以《王国维与中国当代词学》为题发表于香港^[10],对前此本书《前言》进行补说,以为中华千年词史可以王国维为分界线,之前,批评标准是本色论,属旧词学;之后,推行境界说,为新词学。并较详细论述境界说之功与失,认定王国维“堪称为中国当代词学之父,他的《人间词话》堪称中国当代词学的奠基作品”。2003年,在增订本前论中又说,近一百年来,有意立说并真正立了说的只有王国维与胡适,这体现在词的分期、分类上。受此启发,他决定以《人间词话》手订稿刊发的1908年为界划分古(旧)、今(新)词学,又将今词学分为开拓期(1908—1918)、创造期(1919—1948)、蜕变期(1949—1995)三个时期,并把第三期再分批判继承阶段(1949—1965)、再评价阶段(1976—1984)、反思探索阶段(1985—1995),此后属于新的开拓期。同时,也进而认识《人间词话》不只讲词学,而是一种深广的人文精神思考。

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是紧接《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另一专著。此外,他还有一些重要论文及著作必须关注。如《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演讲》,首次正式推举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王国维的境界说与吴世昌的词体结构论为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并就三种批评模式的三种言传形式似与非似、有与无有、生与无生所生发的问题进行分析,说明其对于词学传承之效用;然后说明这三种批评模式、三段里程,各有地盘和价值。从而走出误区,放眼前景。又,《倚声与倚声之学——关于文体因革以及科目创置问题》一文,说20世纪后半叶的词学处在误区当中,主要是将韵文当语文看待,或者脱离文本,悬空高论,或者拘泥于字面,剑走偏锋,或者二者兼有。指出:声学与艳科是一个问题的两

方面，倚声填词既为声学，亦为艳科，二者可有所偏重，不能偏废。应正本清源，掌握根本。又，《二十世纪词学传人》等文，则说词学至20世纪已成一门独立学科，而20世纪与《当代词综》所说“大当代”概念内涵不同，故划分年代有异。他将二十世纪词学传人划分为五代：第一代，1855年之后出生人士，五人，一支篮球队；第二代，1875年之后出生人士，十一人，一支足球队；第三代，1895年之后出生人士，二十二人，为甲乙两支足球队；第四代，1915年之后出生人士，二十一人（暂缺一人），同样是两支足球队；第五代，1935年之后出生人士，暂不编排。朱孝臧、王国维、夏承焘与施蛰存、邱世友与叶嘉莹分别为各代领头人。文中并说明各代位置与职责，其中第二、四代分别为由旧到新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传统文化二次过渡。有功绩，有推进，更有失误和教训。又，《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关于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一文，首次提出中国词学学这一概念，并为中国词学学这一学科概念作界定，明确提出：中国词学学是研究词学自身存在及其形式体现的一门学科。

又，《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的建造问题》一文^[11]，从哲学、文化学角度在更大范围内为词学学提供理论说明，也就是在词史、词学史的演变过程中，对其存在及其形式体现进行总体把握，将所谓三碑之说作为词学学之基础，并对其形成过程等详加追寻。

在探索的整个行程中，既遥望星空，不忘祖宗，又深接地气（现状、文本），知本末始终，自得于胸，拨荆而行。笔者在论说其他词学家时，曾多次说过创新的学术意义，但如何才能创新，实非易事。饶宗颐先生说：“创新总是有来源的，或者来自传统，或者借鉴别人，绝无横空出世的神话。”^[12]施氏发明师说的想法与做法正是如此。这里，不妨引述施氏自己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我同意饶宗颐的说法，做学问包括词学研究，要能达至自觉的程度，并不那么容易。一般得先模仿。所谓依遵古训，就是发明师说，继续前辈的未竟之业。孔夫子称之为述而不作，在很大程度上讲，也就是照着做的意思。”施氏并以自己为例，加以证实。他说：

我在阅读胡适的过程中，逐渐了解胡适，自己的某些想法，包括思想、观点，乃至思考问题的方法，有的也来自胡适。比如，胡适将中国千年词学划分为三个大时期，并将第一个大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我用他的这把开山斧，将千年词学给劈成两半：一九〇八年之前一半为古词学；一九〇八年之后一半为今词学。我不用一九一九年为分界线，而以一九〇八年为分界线，因为这一年有个大事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在这基础上，我将今词学的一百年，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八年是开拓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是创造期，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五年是蜕变期。并将蜕变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再评价阶段、反思探索阶段。我的划分，既是照着讲，又是接着讲，既是从胡适那里来，又能够体现自己的见解。^[13]

这话已经把继承中的创新说得很明白了,但问题是,其说是否符合词史上的真实?是照葫芦画瓢,死板论定还是什么?似乎有点复杂,但他有自己的理由。因为在他看来,宋元明清千年词学,一代代下来,还算清楚。惟这20世纪词学,出了不少问题,比较麻烦。他相信自己有识见和观念,即相信自己的总观感,也就是“相信自己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而只是在寻找伐柯斧头。王国维与胡适便是此斧之提供者,所以他说:“我以为,借镜于王国维、胡适二氏之开辟,所谓划分、判断,应当有一定把握。”这其实源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民族文化的根本态度,其谓“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就必须照顾到和看到传统文化中那些值得借鉴、继承的内容。如果我们不立足于自身民族特色,而去空腔一面地嚷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我看那不过是文化的空中楼阁”。具体到词学,说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学科都被推到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词学之成为显学,与此密切相关。我并不盲目地拒绝美学或者文化,但考虑阐释问题。以为所谓阐释,多数只是一种包装,一种玄学包装,看起来十分豪华,十分气派,拆开后并不见有何新鲜玩意儿”^[14]。所以,他主要在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觅灵感和药方,祛除时弊,指向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做法正如饶先生所说是借鉴别人,是“照着说”而非照抄,是“接着说”而见新意,民族特色尤其浓郁。

(三) 通变与实证:发明师说,更上层楼

自20世纪60年代起,施议对从师问学,跨越了好几个年代。如将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大约20年时间,看作施氏研习词学的准备阶段,那么,20世纪80年代,应是施氏词学研究的奋进阶段。此一阶段,只用十年时间,他在词与音乐关系理论、词体之结构模式以及对于宋代某些代表性词人的评价、对于百年词史的析论,皆有突破前人的独异之见,或者说他在词史、词论、词作等主要方面基本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或研究体系,已迈入词业峰巅之门槛。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六七年间,对其所持学说有所补益,词业研究实践亦有某种开拓。这是其词学观念全面成熟、研究体系建构基本完备的阶段。这一阶段,施氏对于王国维、胡适词史观念、词学理论的阐释与落实,对于胡适之体长远影响的探测与认定,对于三碑之说的确立和中国词学学的设计,以及形上词创作的倡导,等等,说明施氏关于词与词学、词学与词学学的全方位蓝图已基本绘就,而且,其对于所谓词中六艺(词集、词谱、词韵、词评、词史、词乐)在一定范围内也已进行过尝试。相关业绩,标志施氏在词业理论与实践活动两个方面均已达至一崭新阶段。

以下说一说进入新世纪后,施议对所发表的几篇文章及其对于若干词学问题的思考和见解。

在相关文章中,《百年词学通论》一文堪称《百年词通论》一文的姐妹篇。文章重新整合之前所述关于古、今(旧、新)词学分期分类及建构词学学之设想,并附20世纪词学传承图,谓词学学科的真正确立当以龙榆生为起点,算是集大成的一篇。《立足文本,走出误区——新世纪词学研究之我见》一文,谓只有纠正旧世纪词学的失误,实现由变到正的转换,新世纪词学才能发展。过去词学之蜕变,乃时代风气使然。词学与学词分离的结果,离开了文本,误了两代人,应记住这一教训。他认为:

词学的真传在“音理不传，字格俱在”上，出生于1955年后和1975年后的新世纪第一、二代传人，应效法民国四大词人（夏、唐、龙、詹）之风范，记取正、反经验与教训，举一反三，努力打开新的局面。《新宋四家词说》视频演说^[15]，则反周济旧《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所说“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为“由屯田之家法、易安之‘别是一家’，历东坡、稼轩之变化，以还词之似词”。柳永立程氏，完善宋初体，奠定宋词基本结构模式；苏轼创新意，建造新型独立抒情诗体；李清照主本色，明确划分声诗、乐府界限；辛弃疾变新法，随心而不逾矩，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落脚点是词之似词之境界。又说一千年之研究，无非“情”、“景”二字，再加“言”（王国维）、再加“事”（吴世昌）、再加“理”（饶宗颐），握此五字，说诗论词便可到位。《文学研究中的语汇与语汇系统——关于宋初体以及宋词基本结构模式的确立与推广》一文，说要成就学问，除观念及方法、模式外，必须有自己的语汇且须构成语汇系统。语文讲词汇，韵文讲语汇，布景、说情、叙事、造理是一般韵文系列的语汇系统。从体制上看，上片布景、下片说情即宋初体，其确立与推广，要归功于柳永。《声成文，谓之音》一文，主要讲填词时的倚声问题，就是既倚乐歌之声，又倚歌词之声。但音律规范乐音的组成，声律规范文词的组成，分别是乐音和文词的法则。永明四声自沈约起，音律与声律两个不同概念的意涵较为清晰呈现，并为乐歌脱离音乐创造了条件。倚声而填词，自温庭筠起，以文词的声律应合乐歌的音律，亦为歌词脱离音乐创造条件。然音律与声律乃近世词界的盲点，应揣摩词学中所谓“音理失传，字格具在”八字要诀及龙榆生、夏承焘先生的声调之学，方可登入词之艺术殿堂。

《唐宋词读法总说》一文，用很多实例说明要读原书，立足文本；更要读形式（词的文词与词调），体验声情与词情；并以画线的方法区分形上、形下，力图将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定律与易学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接轨，创造一套既能操作又能提升到哲学层面的中国诗词学理论。《民国四大词人》系列文章，对其所认定的民国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加以推扬^[16]，并分别定位。夏承焘：一代词宗与一代词学的综合，意即集大成；唐圭璋：中国词学文献学的奠基人；龙榆生：中国词学学的奠基人；詹安泰：中国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人。说他们为倚声填词创造一代辉煌，亦为新世纪词学诸学科建设打好基础。新世纪新一代传人，可以之为入门途经，从而光大词业。

凡此种种，前文基本已述。当然，施氏还讲到其他议题，如词与乐关系问题，形上词问题，中国诗学问题，对某些词学非凡人物的访谈或析论等。他这一系列的讲论，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一整套有机的研究体系，也确乎给人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即在当今词坛和词学界，卓然一家，自立旗幡！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讲，他所做的可谓是纠前失、树道理、明方向。

邱世友先生接到施议对所赠书，曾来函云：“大作《宋词正体》，未遑细读，然于拙文《柳永词的声律美》已具引矣。顾吾兄从学于夏、吴二大家，得通变之思于吴（世昌），得实证之学于夏（承焘），斯二者词学专家，各以其治学特点授兄，而兄则融二家之长，成独有之治词风格。”并云：“吾兄问学得吴通变之理者，重在西学；得